

響音堂山北朝刻經書法

三唐邕寫經碑外三種

● 趙立春 編著

東氣帝稽首
世我龍託大齊
俯順龜龍託迹
之賓自如葉結
開府儀同三司

王季仲



赵立春 编著

河北响堂山北朝刻经书法

三 唐邕写经碑外三种

重庆出版社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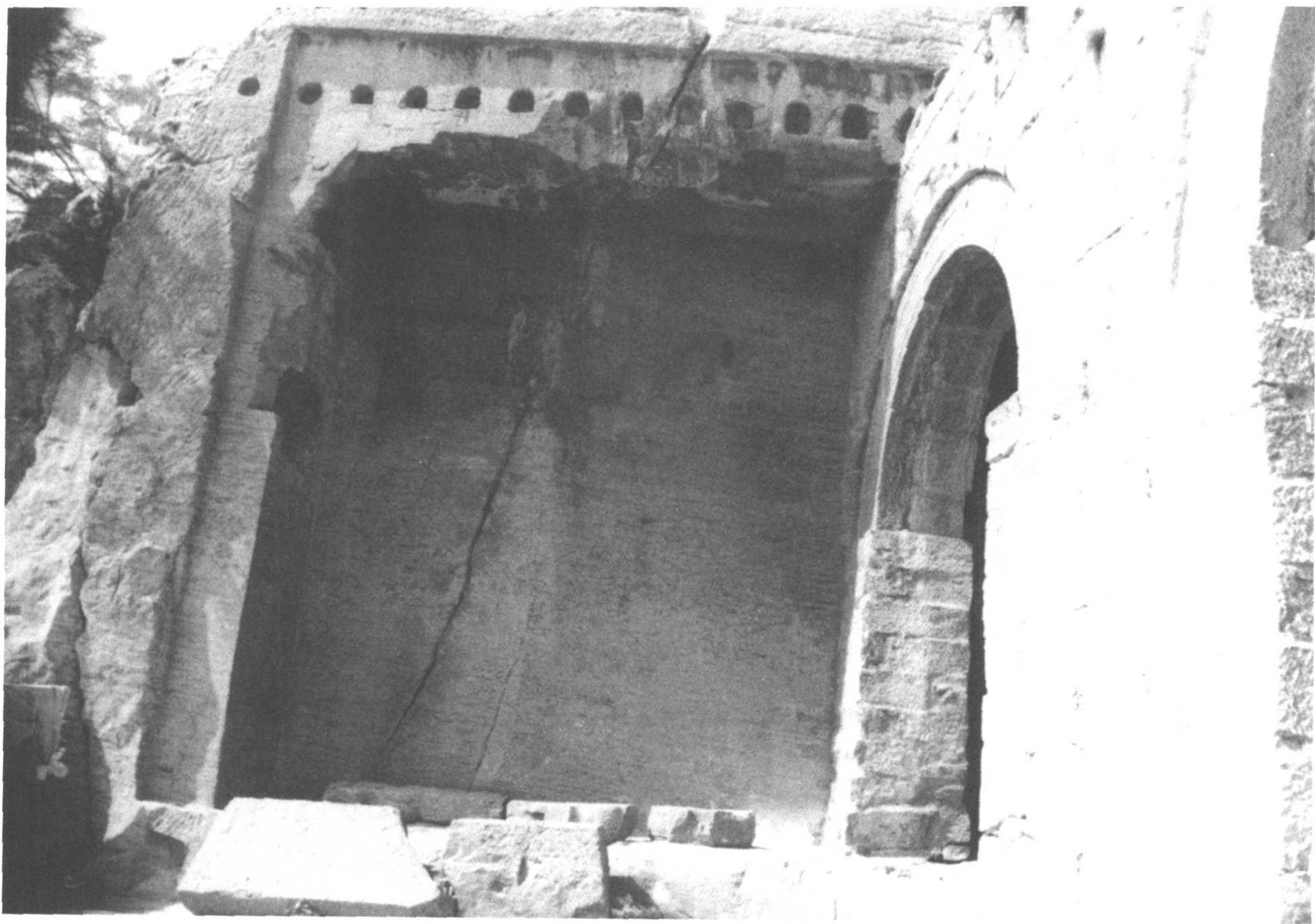
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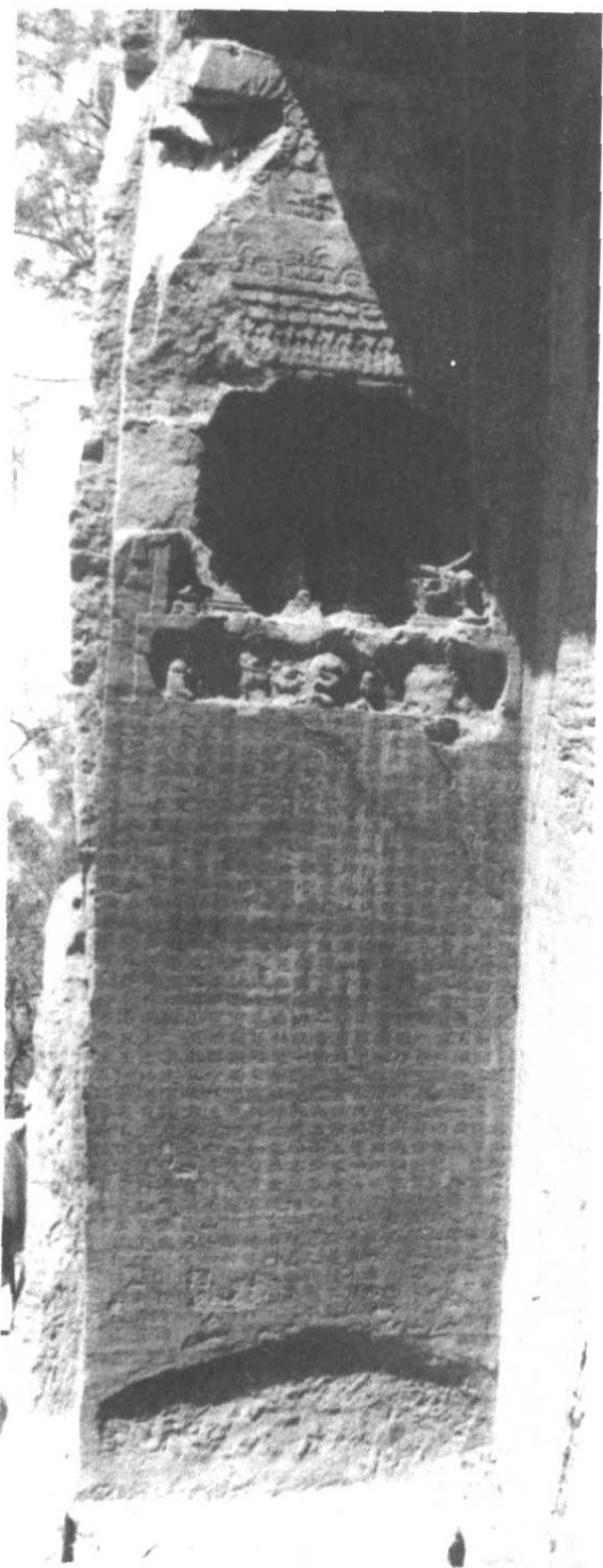
色

主
年
刻
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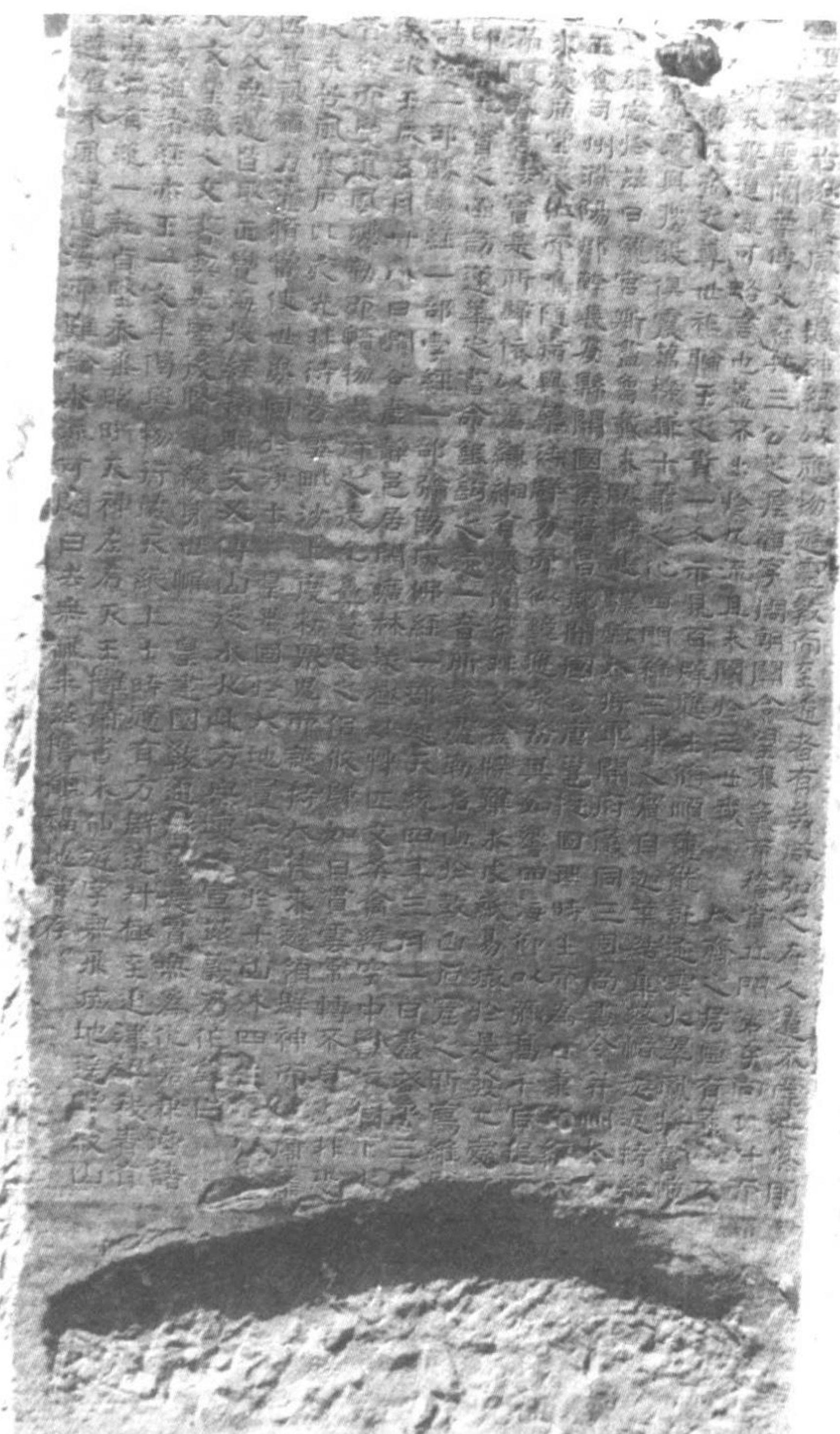
姚小尧
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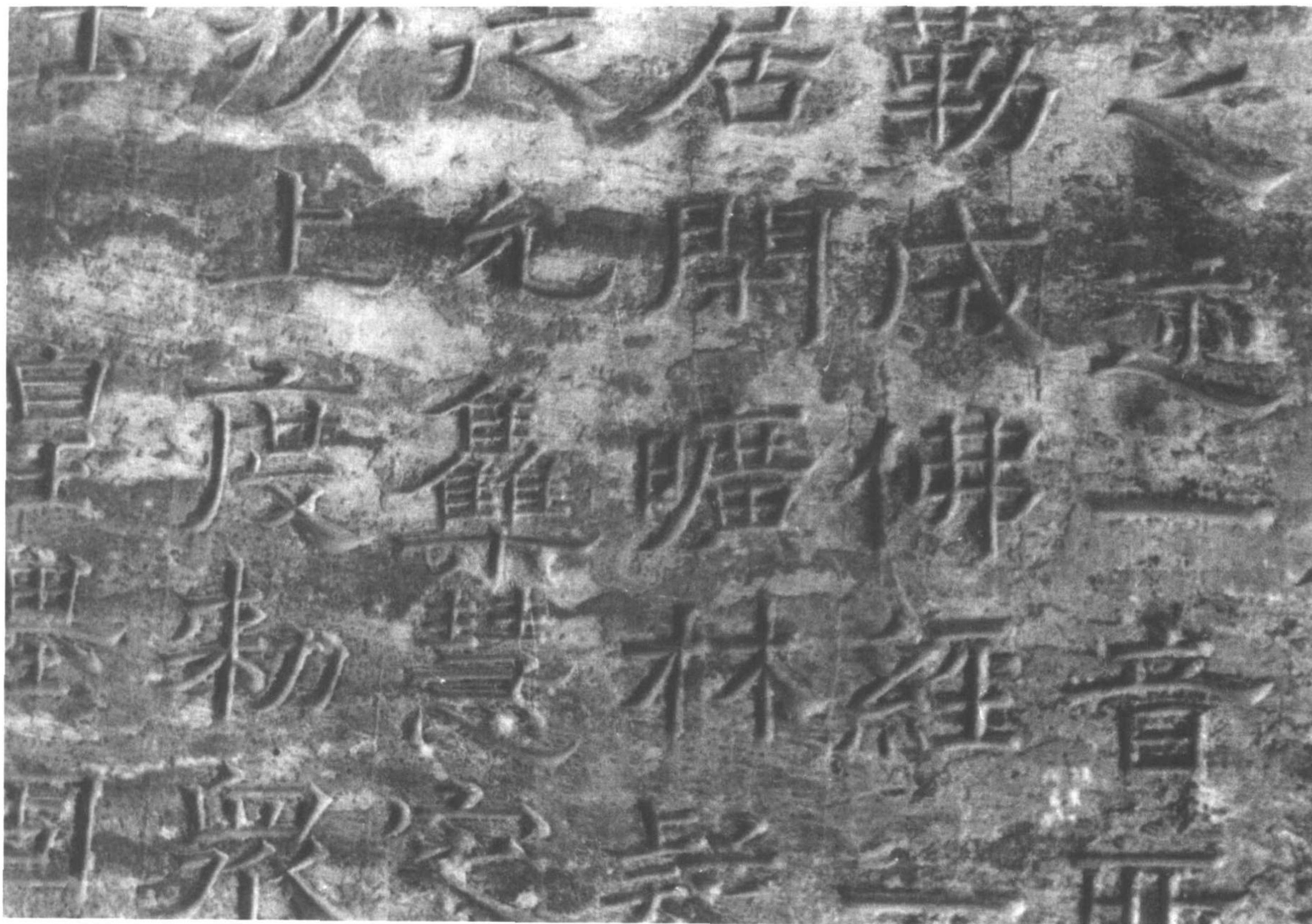
北齐唐邕写经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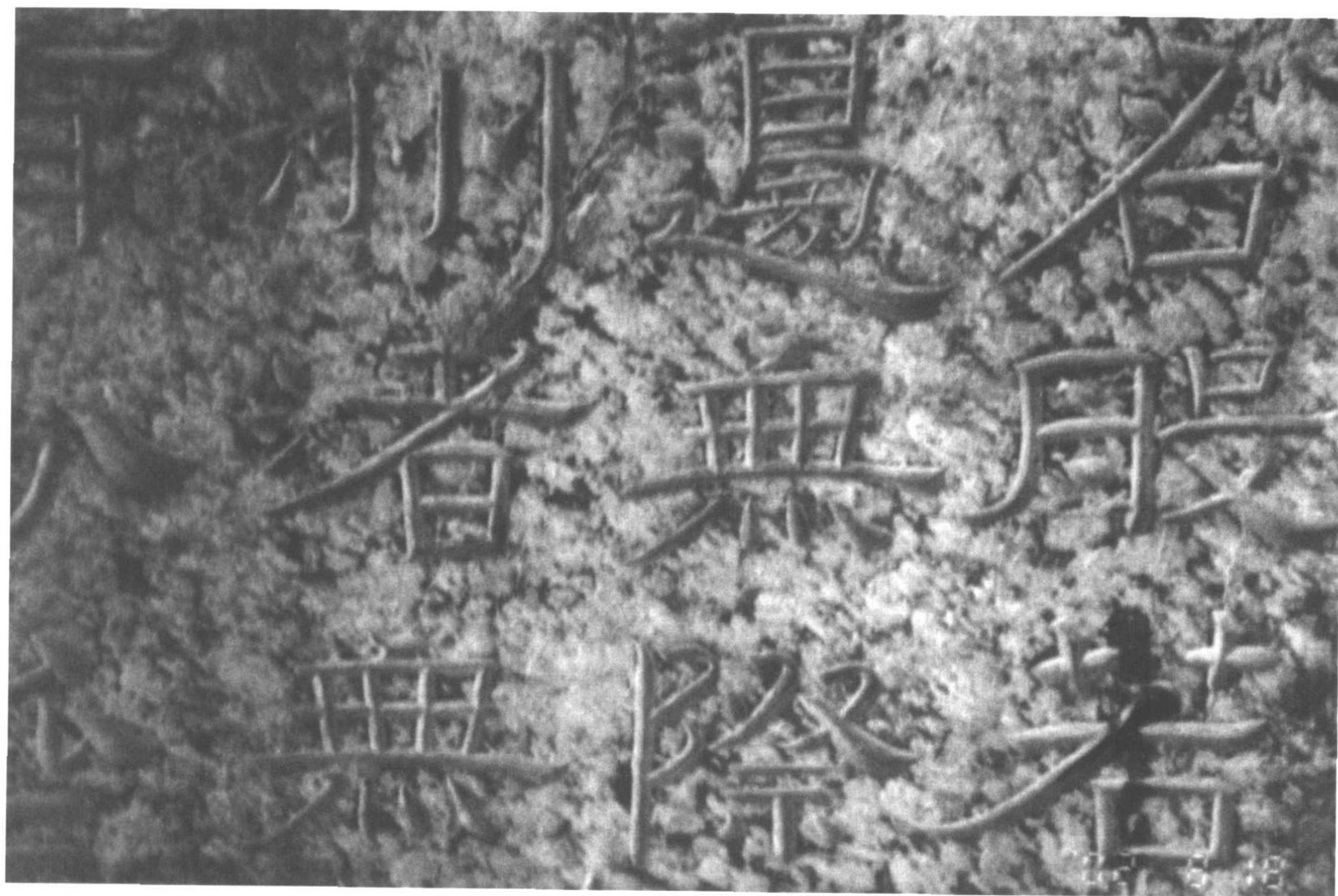
北齐唐邕写经碑



北齐唐邕写经碑（局部）



北齐唐邕刻经碑（局部）



南响堂第二窟《文殊般若经》（局部）

河北响堂山石窟的北朝刻经及书法

● 赵立春

全国石窟大面积摩崖刻经的出现，最早始于河北的响堂山石窟。有关响堂山石窟石刻佛经的情况在过去许多史籍及金石著作中均有记载。如《畿辅通志》、《续寰宇访碑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历代金石分域》、《河朔金石卷四》、《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均记录了响堂山的石刻佛经和造像发愿文。此外，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也列出了响堂山的《鼓山石经》、《唐邕写经碑》、《李君巧造像》等五处石刻碑品。可见，响堂山刻经书法在过去是颇有影响的。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刻石却鲜为人知，几乎湮没于世。为此，我们编辑此册，意在抛砖引玉，期待专家学者赐教。

响堂山及石窟

响堂山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分南响堂山、北响堂山两处。两山均属太行山支脉，南响堂山原名滏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东魏、北齐时期，皇家贵族分别在山上建凿了南北两座寺院，初名为滏山石窟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后统称为响堂寺，近代则习称为响堂山石窟。

东魏、北齐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并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其陪都，高欢、高澄、高洋父子三人为主的皇室贵族经常往来于二都之间，而响堂山是其必经之路。据现存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三石室即指今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新编第9窟）、释迦洞（新编第1窟）、刻经洞（新编第3窟），可见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室营建的一座皇家寺庙。

响堂山石窟现存大小石窟三十余座（见赵立春文《响堂山石窟的编号及内容简录》），造像4300余尊，其中北响堂山石窟（鼓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龕22座，南响堂山石窟（滏山石窟）现有编号窟龕9座（处）。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时期，其后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国均有不同

规模的雕饰和粉修。

北响堂石窟 北响堂石窟原名鼓山石窟，造像洞窟主要集中在鼓山之腰。石窟的分布分四个区域，即南区、北区、中区、九条洞区。

南区 共有3个窟

编号 第一窟

别名 双佛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位于南区刻经洞上部

内容 为小型龕窟。与下层刻经洞为上下结构的塔形窟。三壁设低坛，坛上雕像，正壁雕释迦、多宝并座，左右侧各一菩萨。左右壁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进深1.3米，宽2.3米。

编号 第二窟

别名 大业洞

时代 隋

位置 位于刻经洞南侧

内容 窟形不规则。左、右、正三壁满刻小龕。正壁刻5个小龕，右壁3个大龕2个小龕，左壁1个龕。皆为隋代所刻。正壁右上方有『隋大业七年李君巧造阿弥陀像一铺』铭记，故名大业洞，深1.8米，宽2.15米，高2.5米

编号 第三窟

别名 南洞 刻经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位于石窟区南部大窟

内容 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分前廊后室，窟外立面与上层第一窟合成一个覆钵塔形，前廊满刻《维摩诘经》全本。甬门左右侧为力士像，甬道内雕刻精美的缠枝纹和联珠纹饰，主室平面方形平顶，顶部雕刻莲花藻井。正壁及左右壁开大龕，龕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胁侍七尊像。龕下设低矮基坛。正壁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须弥座上，手施无畏印。像高2.3米，前壁甬门左右侧刻《无量义经偈》；窟外北侧有《唐邕写经碑》一通，记述刻经时间为『起天统四年：尽武平三年：（568—572年）。』是研究北朝刻经的重要资料。窟深5.3米，宽7.7米。

编号 第三窟附一号

别名 塔龕群

时代 北齐 隋

位置 第3窟北上方向约20米

内容 为一组雕刻精美的塔形龕群，计有3个塔形龕，每龕形制各不相同，与安阳宝山灵泉寺摩崖塔林相同。原有铭记不可明辨。

中区 共四个窟

编号 第四窟

别名 中洞 释迦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中部大窟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四柱三开间，窟分前后室，后室正中雕方柱，方柱左、右、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甬道。方柱占室内大部面积，方柱正中为大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龕外两侧绘壁画，拱门左右侧雕二菩萨，次间大龕内雕二天人。窟外立面也为覆钵塔形。窟深7.1米，宽7.8米。

编号 第五窟

别名 三教洞

时代 宋

位置 第四窟前室北壁

内容 为一小型龕窟，后壁基座上雕三尊坐像。正中为释迦佛，左右两侧为老聃和孔圣。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表现，应为宋代以后雕凿。宽1米，进深1.5米。

编号 第六窟

别名 小天宫

时代 隋

位置 位于第四窟北上部15米

内容 为小型龕窟，主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胁侍七身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龕内，二胁侍雕于龕外。龕下有八个圆拱尖楣龕。进深1.8米，宽1.5米。

编号 第七窟

别名 关帝洞、明洞

时代 明

位置 位于第四窟北侧5米

内容 窟平面呈正方形，后壁开龕，龕内雕关帝坐像，左右壁及上侧雕千佛，右壁有『嘉靖二年（1524年）造二十五佛、观音菩萨铭』进深约2米，

宽2.8米。

北区 共四个窟

编号 第八窟

别名 宋洞

时代 北齐（见刘东光文《响堂山拾遗》）

位置 位于北区大佛洞南侧，座南向北。

内容 窟平面呈长方形，后壁开大龕，龕内雕一铺七身像。其造像风格、雕刻技法及莲花座饰与北洞北齐像相同；右壁刻七佛。窟门甬道左侧有「宋康定二年新修七佛记」铭刻。进深1.5米，宽3米。

编号 第九窟

别名 大佛洞、北洞

时代 东魏、北齐

位置 石窟北区大窟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分前后室，前室坍塌，后室（主室）平面呈方形，平顶。中心方柱三面开龕，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主尊造像为三世佛题材，基坛上雕神王形象。窟室四壁满刻二座塔形列龕。前壁为上下两层的「帝后礼佛图」，为物象外减地平浮雕，是国内石窟中最大的礼佛图。惜坍塌残缺。中心方柱顶部有文献记载的「高欢陵穴」，方柱顶部第三龕为穴门，洞穴深3.87米，宽1.35米，高1.77米。四面素壁。该窟中心柱正面龕主尊高3.5米，结跏趺坐于圆形莲花座上，敷搭双肩式袈裟，衣纹细密。两侧为二菩萨像，左右壁大龕内均刻一佛二菩萨三身像。窟深12.5米，宽13米，高12.5米。

编号 第十窟

别名 文官洞、明洞

时代 明

位置 石窟北区第九窟北侧，座北向南。

内容 窟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大龕，龕内雕释迦像，左右侧为骑狮、象的文殊、普贤菩萨，左右壁各雕一立像，身着朝服，为文官形象（水野、长广氏称为神王），窟深3.3米，宽4米。

编号 第十一窟

别名 隋佛龙

时代 唐、宋

位置 位于北区台阶下北侧

内容 窟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后壁开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为唐代雕凿，左右壁为宋代雕刻的龕像。前部券顶为清代修筑。洞深5米，宽3米。

编号 第十一窟

别名 天然洞

时代 唐

位置 第十一窟外侧上部

内容 此处原为一天然凹穴。现刻有一组唐代小龕，东侧崖壁上有铭记，磨灭不可辨，其上部原有一高大的露天立像，现无迹可寻。

九条洞区

九条洞区位于登山路左侧，自上而下依次编号为第12、13……21窟，均为小型龕窟。史料记载，清代龕内均有佛像，今无存。有些龕为圆拱尖楣形。圆拱正中饰一束莲。龕柱正中也饰一束莲。从龕的形制看应为隋唐时期开凿，九条洞的南侧20米处为第22窟，开凿于唐代，为小龕窟，窟内造像残。崖壁有「琳书」等字残石刻，多磨泐不清。

南响堂石窟

南响堂石窟，原名滏山石窟，隋开皇十三年称为滏山响堂寺。共有编号窟8座，摩崖造像群一处（东方摩崖造像）。

编号 第一窟

别名 华严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下层东南侧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平面方形平顶，分前后室，前室后壁为四柱三开间式，四柱头出小柱，小柱承托斗拱，拱托仿木结构的窟檐。明间开甬道门通向后室；后室正中设方柱，方柱后壁与山体相连，下设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方柱正壁开帐形大龕，龕内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七身像。基坛上刻供养比丘和狮子。左右壁龕稍小，雕一铺五身像，龕上为千佛，窟左右壁上各开五个尖拱龕，后壁于方柱两侧上下各开两龕，右壁及前壁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左壁下部为隋唐补刻的小龕，前壁甬道的上部为「阿弥陀净土变」，变相两侧为明窗，洞深、宽均为6.35米。

编号 第2窟

别名 般若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下层西北侧

内容 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分前后室。窟形与第一窟基本相同，只是后室中心方柱仅正壁开大龕，左右壁不开龕。龕现残，原雕一铺五身像，窟左

右壁及后壁开七个圆楣尖拱龕，龕内置像，龕柱上刻十六佛名号。前壁右侧及后甬道内刻有《般若经》和《修行道地经》。窟门外左右侧有『滏山石窟之碑』，为隋刻，记载了『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开窟的过程，是响堂山唯一一处记载开凿纪年的碑刻。窟深6.5米，阔6.36米，高4.52米。

编号 第3窟

别名 空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上层的东南端，一窟的正上方

内容 窟分前后室，前室左右壁角刻八角束莲柱承托仿木结构的窟檐，窟顶浮雕大型山花蕉叶。后室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无雕像。该窟与下层窟为一体，合称为楼阁式塔形窟（见赵立春文《响堂山北齐塔形窟龕》），窟深2.5米，宽2.7米。

编号 第4窟

别名 阿弥陀洞、观音堂

时代 北齐

位置 石窟区上层南2窟

内容 窟平面近方形，平顶。正壁、左右壁及前壁设环坛，正壁及左右壁各为一铺五身像，正壁原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二菩萨作半结跏趺坐于束腰圆形莲座上，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身体清瘦俊丽。右侧菩萨像有榜题『观世音像，侍佛信女李华晖』。左侧菩萨侧刻『世主清信女爰公主』。佛右方有『曹子绪，曹子绪侍佛』，三壁均供奉阿弥陀像。左右壁前壁上部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洞内造像均毁，仅存刻经，深3.34米，宽3.36米，高3.5米。

编号 第五窟

别名 释迦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与第四窟紧邻之右方

内容 圆拱形窟门，窟门原为羽狮承莲柱造型。窟外有檐，可知4、5、6窟原为一组洞窟。窟平面近方形，穹窿顶。地面浮雕大莲花。窟顶为飞天莲花藻井。三壁开帷幕帐形龕。龕内均为一铺三尊像。正壁主尊半结跏趺坐。左壁主尊结跏趺坐。右壁主尊倚坐像。正壁左上角有思惟菩萨像，并作白马吻足场面。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方为涅槃像。洞深2.1米，宽2.3米，高2.5米。

编号 第六窟

别名 力士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居第五窟右侧

内容 窟平面方形、盪顶。四壁设坛。正壁造像为一佛四比丘二菩萨组合。主尊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着袒右袈裟。两侧各有二比丘。前壁及左右壁的角端为二菩萨像。菩萨头戴宝冠，亦坐于束腰莲座之上。前壁窟门两侧雕力士像，力士亦立于基坛上。左右壁均为一铺五身像，洞深3.2米，宽3.2米，高3.9米。

编号 第七窟

别名 千佛洞

时代 北齐

位置 上层石窟的最右端

内容 窟平面近方形，穹窿顶。为三壁开龕式佛殿窟。正面龕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主尊为释迦佛。左面龕主尊为阿弥陀像，为倚坐像。右面龕主尊残失。基坛上雕有神王形象。窟顶为莲花藻井，四面各两身对看的飞天或伎乐。该窟外观为四柱三开间形式。窟顶雕凿出仿木构建筑的瓦垝滴水、斗拱、叠涩基等。叠涩基上有山花蕉叶和覆钵丘。此即为响堂最典型的塔形窟。前廊次间雕力士像。洞深3.48米，宽3.7米，高3.8米。

编号 第八窟

别名 西方洞

时代 宋

位置 石窟区西北约50米

内容 窟室后壁处雕出石床，右壁有「太平兴国……」造像铭。窟外右侧山坡有隋刻的千佛。

编号 第九窟

别名 东方摩崖造像

位置 石窟区东侧

刻经概况

响堂山石窟刻经主要分布在北响堂寺的刻经洞内外、南响堂寺的第一窟、第二窟和第四窟内壁。

北响堂寺刻经洞位于北响堂山石窟区最南端，为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其外观为单体覆钵塔式。窟分前后室，在后室前壁拱门的两侧壁刻有萧齐昙摩伽陀耶舍翻译的《无量义经·德行品》，右壁刻16行，行21字。左侧18行，行21字。字径寸五分，正书。前室窟廊内刻《维摩诘所说经》全本，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自拱门右侧东壁开始。东壁56行，行百字。北壁33行，行百字。西壁56行，行百字。拱门左侧西面50行，行百字。南壁35行，行百

字。东壁43行，行百字。均为八分书。该窟外拱门左右两侧通壁刻满经文，北侧亦为大面积的摩崖刻经，惜风雨剥蚀久甚，已无法辨认。根据现存于该窟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字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可知，这些残损刻经当为《胜鬘经》、《字经》、《弥勒成佛经》。此外，刻经洞前廊左侧角廊柱上还刻有北魏菩提流支译的《佛说佛名经》中的佛名号。洞外左侧壁刻有《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刻经洞上部刻有十二部经名，出自姚秦鸠摩罗什译本《摩訶般若波罗密经》卷一。十二部经名的上部刻有出自《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弥勒佛、狮子佛、明炎佛三佛名号及大圣十号。三佛名号的左上角刻有「大空王佛」四个字。

刻经洞南侧的大业洞内刻有《佛说决定毗尼经》中的七佛和观世音名号。

在北响堂半山腰还刻有北凉昙无讖译本《大般涅槃经》卷28《狮子吼菩萨品》一节。

南响堂寺第一窟位于石窟下层西端，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分前后室，前室塌毁，仅存左、右、后三壁。后室为主室，平面为方形，中心设方柱，方柱三面开龕。后壁上部与洞窟后壁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后室的前壁正中为洞门，上部有二明窗，供洞内采光。左右壁上半部为圆拱尖楣列龕。右壁及前壁明窗以下为刻经。刻经保存较完整，为隶书，寸字，字体较瘦劲。自右壁右端始，计155行，行55字左右。为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如来光明觉品第五。前壁洞门左侧计68行，行60字许，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菩萨明难品第六。前壁洞门右侧计28行，行55字，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净行品第七。

第二窟位于第一窟东侧，洞窟型制与第一窟相同。刻经在前壁洞门的右侧和后壁的甬道内。前壁右侧10行，行12字，前七行为萧梁曼陀罗仙译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訶般若波罗密经》卷下节文。全文为：「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犹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訶萨行处。非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计80个字。其后的两行半共20个字，内容为「知诸众生，心性本净，是名为慈。观于一切，等如虚空，是名为悲。断一切喜，名为喜心。远一切行，名为舍心」，在过去许多著述中，这两行半的内容没有被识读出来，只是笼统地将其与《文殊师利所说摩訶般若波罗密经》合为一处，经过进一步辨识，这段经文应该为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于姑臧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一《海慧菩萨品》第五之一中的内容。同样内容在山东邹城北郊铁山也有刻出。第二窟后壁甬道内刻《摩訶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七《法尚品》第八十九（丹本昙无竭品），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计28行，行80字，多有磨泐。隶书、径四五寸许，结体浑朴，楷法作隶间参篆意。原文为：「善男子。诸佛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何以故。诸法如不动相。诸法如即是佛。无生法无来无去。无生法即是佛。无灭法无来无去。无灭法即是佛。实际法无来无去。实际法即是佛。空无来无去。空即是佛。善男子。无染无来无去。无染即是佛。寂灭无来无去。寂灭即是佛。虚空性无来无去。虚空性即是佛。善男子。离是诸法更无佛。诸佛如诸法如。一如无分别。善男子。是如常一无二无三。出诸数法无所有故。」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在三十年代曾经有过录文（见《响堂山石窟》日文版），但有些出入。其中第二句的「诸佛无所从」的「无」字水野清一录文为「诸佛天所从」。第五句的「诸法如即是佛」水野录文误将「是」为「具」，为「诸法如即具佛」。第八句的「无灭法无来无去」，水野录文为「无灭去无来无去」，将「法」误录为「去」。第二十三句的「诸佛如诸法如」漏录前一个「如」字。此外，第十四句的「善男子」一句，水野录文中没有，不知道是漏录还是原碑刻中就没有，因现在甬道内堆满南响堂山石窟旧有石刻残像，不能进一步考证校对。此外，在洞窟四壁列龕的龕柱上，还刻有十六佛名号。

第四窟位于第二窟之上，为三壁设坛式佛殿窟。方形平面平顶，坛上雕像。刻经自右壁开始，环前壁至左壁。右壁41行，行15字。前壁37行，行15字。左壁35行，行15字。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五》，姚秦鸠摩罗什译。八分书，径二寸许。

此外，在南响堂四、五、六窟窟檐上也刻有佛经，风化严重。日文版《响堂山石窟》一书中有录文：「舍利弗/佛云何/佛云何/……」等等，据张总先生考证，此为《文殊般若经》。第六窟上方刻有《大般涅槃经》卷14《圣行品》中的「诸行无常偈」。

刻经年代及书家唐邕

南响堂的石窟开凿时间，现存于第二窟门左右侧的由隋代沙门道净撰写的《崧山石窟之碑》有详细记载：「……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仰惟至德，俯念颠危，於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565年），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翼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崧山之窟，至若灵像千躯。……功成未几，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碑文中没有提及刻经之事，只记载了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和经过（见赵立春文《南响堂新发现的纪年碑》）。从碑文我们可以知道，南响堂山最早草创于灵化寺比丘慧义，但大规模的兴建活动则是由北齐大丞相高阿那肱资助营建的。因此，高阿那肱实际就是南响堂山石窟的营造主。

南响堂第一窟内的刻经分布在洞内右壁和前壁，从右壁前端开始至前壁东端结束。而右壁前端开始部分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末「□分别印，或名人相」，这段文字即非该经文的章节开始，也非章节内文的分段部分，这样出现的文字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左壁中央刻有三个隋代佛龕及若干唐代小龕，这些均为后代补刻。而最早的一个龕为隋开皇八年（588年）袁子才造像记，因此，可以知道，在北齐开凿洞窟的时候，这个壁面是素面。李裕群博士曾对这一现象作过考证，他认为北齐时期，壁面平整，没有开龕。「《四谛品》前面部分的经文似应计划刻在左壁，这与从左到右刻经顺序相吻合。如果推测不误的话，左壁除刻《四谛品》外，至少还有刊刻一品经文的壁面空间，按右壁共155行，满行88字，合计约七千字。《四谛品》前面部分有近三千字。故左壁约余四千字的壁面。又从《四谛品》到《净行品》四品前的《如来名号品》，即华严八会中的第二会——普光法堂会的第一品（《四谛品》——《净行品》，皆属第二会）。该品篇幅较短，约三千余字，足够刊于剩余的壁面空间」（见李裕群文《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李裕群博士对刻经内容的这一推测，本文是赞同的。但李裕群先生在后文中又说：「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可以判断洞窟开凿时，考虑了刻经的安排和龕像的布局。至于刻经没有完工，应与北齐灭亡，北周武帝灭法有关」。这一判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

南响堂第二窟内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和《大方等大集经·海慧菩萨品》也无镌刻年代。但这两方石经的字体和镌刻刀法几近相同，因此，这两方石经应该是同时代的。在经文的下部有唐代的列龕，这些小龕显然是破坏原来的刻经壁面后刻的，故晚于刻经。其中一龕有「唐景龙二年（708）」题记。这可作为此处刻经的下限。又，该窟后甬道内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尚品》书体风格也与《般若经》相同，镌刻年代也应该相去不远。

第二窟内的「十六佛名号」出自《法华经·化城喻品》。据《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记载，「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

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闍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神通。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十六佛名号分刻在第二窟主室周壁列龕的龕柱上，自窟室右壁前端始，左壁前端終。現可辨認出『第三師子音佛，第四師子相佛……第六常天佛……』等多處。過去，曾有學者提出，該窟內周壁十二列龕中的坐佛既是此十六佛。但从現狀看，单龕數量与十六佛不符。即便是加上中心方柱正面的釋迦像和前壁上部的阿彌陀像也才十四身佛像，仍不能与十六佛契合。河南偃師水泉石窟洞口的石碑上有『造十六王子行像十六区』的題記。水泉石窟开凿在北魏太和十一年，完工于景明、正始年間，这是最早的十六王子造像材料。此外，隋开皇四年（584）的阮景晖造像碑記中，也有『敬造十六王子之像壹軀……开皇四年九月庚申朔廿五日甲』的題記。山东东平县隋代开凿的白佛山石窟內，亦是在一龕佛像之旁題十六王子像主的銘刻。据張总先生考证，此『敬造十六王子之像壹軀』是指釋迦像（張总文《十六王子像小記》）。根据石窟造像的一般情况，造像施主在施造佛像时若要写明佛名大都在佛像旁，譬如安阳的小南海石窟。如果二窟內的十六佛刻銘与石窟是統一设计，且周壁列龕內已安置十六佛尊像，那么，为什么直接设计成周壁的十六龕布局或十四龕布局，而设计成十二龕布局？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列龕龕柱上的十六佛名号鐫刻也不規整，有的龕柱上刻两个佛名，有的只有一个，字体也大小不一。从各种迹象来看，十六佛名題刻应该是在石窟完成后又补刻上去的，其具体年代应该与隋代重修时有关（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中也將此十六佛名号定为隋刻）。

关于南响堂第四窟內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鐫刻年代，李裕群博士認為『南响堂第一窟，刻經分布于左右前三壁上部，下部雕刻造像，……估計△窟造像与刻經也是同时考虑的。』过去，我們也曾笼统地将第四窟內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定为北齐，对于这种观点，現在也需进一步商榷。《妙法蓮華經》，简称《法華經》，共七卷，二十八品，姚秦弘始八年（406年）鳩摩羅什译。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的经典，为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在鳩摩羅什译前一百二十年，即西晋太康七年（286年），就有竺法护译出《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什译后一百九十五年，即隋仁寿元年（601），又有闍那崛多、达摩笈多重勘梵本，补订什译，名为《添品妙法蓮華經》八卷，二十七品。以上三译，今皆并存。据《开元释教录》卷十一、十四載：还有《法華三昧經》六卷，《萨芸陀利經》六卷，《方等法華經》五卷三译阙本。但据现代学者考证，似属误传，实际只有今存的三种译本。历代广泛流传讲解注疏，都依据的是鳩摩羅什的译本。《中国佛教》一书记載：『什译本原是七卷二十七品，且其《普門品》中无重誦偈。后人将南齐法献共达摩提译的《妙法蓮華經·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和北周闍那崛多译的《普門品偈》收入什译，构成七卷二十八品。』其后又将玄奘译的《药王菩薩咒》編入，而成了現行流通本的内容。觀世音菩薩是中国淨土宗极乐世界中的第二大神。中国最早弘扬彌陀淨土的人是东晋的慧远大師，于庐山結社依《般舟三昧經》勤修念佛三昧，开中国淨土宗結社念佛之風气。唐代善導大師（人称光明和尚），承昙鸾的称名念佛，续道綽凡圣同往的淨土思想，极力强调佛陀绝对救度的本愿力，是末法众生最相应的法門，奠定了淨土宗教义独立系统的基础。又由于《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单行本的盛行，觀世音菩薩（西方极乐淨土的补处菩薩）三十三应化身成为家喻戶曉的菩薩，而有了『家家弥陀，户户观音』的美誉。到了唐代为避讳李世民，略去『世』字，简称『观音』。而第四窟內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版本中没有出現重誦偈，从这一点上来看，刻經的版本应该是什译本。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窟內所刻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还出現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刻經中所有的『世』字书写均不完整，缺少第四笔的橫划。刻經中出現的『民』也缺少末划，如『当愍此无尽意菩薩』一句中的『民』

字等就是这样。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偶然，显然是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曾有人怀疑这种特殊的背景就是对李世民的避讳，并以此推测刻经的年代为初唐时期。除此之外，在刻经的位置布局上，也并不是统一的设计。应该是在第四窟佛像背后的空白壁面上补刻而成。响堂山的北齐洞窟，不似云冈或龙门那样将洞窟内所有壁面都满刻上佛像，而是空有大面积的素壁未做任何雕刻。如北响堂北洞、中洞的左右壁和前壁、南响堂第二窟的左右壁及前壁右侧、第六窟的四壁上部等。这种现象过去的学者多解释为响堂山因北齐灭亡没有完工，故未来得及雕刻。从《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功成未几，武帝东并，扫荡塔寺，□□敬毁”，说明石窟是在完成后没多久，才遇到武帝灭佛，石窟造像遭到毁坏。从现存遗迹可以看出，这次法难毁坏的造像主要有各洞窟内个别佛的头像、第六窟门外左右侧的力士像、第一窟门外左右侧的力士像、第二窟门外左右侧的力士像等。第六窟门外仍保存有力士像的腿部痕迹和基座。第二窟和第一窟门外的龕内顶部仍有力士像的两条宝缯飘带痕迹。第六窟门外力士像毁坏较重，所以在隋开皇四年（584）被顺阳郡的另一位施主改刻成一座佛龕。第一窟门外的龕内也改刻成了坐佛。洞窟内其他残毁的佛像则被邺县功曹李洪运修复（1986年，在对南响堂进行清理时，出土了许多石刻残像，许多像的颈部呈凹槽状，槽内有石片、铁片等用来补修佛头的固物，疑为李洪运「修此残缺之迹」所为）。可见，南响堂并不是没有完工；至于大面积的窟内素面，我们认为，这也许正是响堂山石窟的独特风格。这些大面积的空白壁面很有可能是用来绘制壁画，从而形成壁画与石刻的完美结合。北齐一代，皇室贵族奢侈浮华，在邺城附近，在响堂山周围，聚集着很大一批专事壁画的工匠。在目前已经发掘的北齐墓葬中，多数不仅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且墓室宽大，甬道华丽，且多绘有精美的壁画。在今响堂山东南二十公里磁县，至今仍保留有东魏北齐时期的大型墓葬达一百多座。已发掘的磁县湾漳北齐大墓、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墓内绘满彩色壁画。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画面达300余平方米，绘有青龙、白虎等四神及有3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像（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高润墓壁画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侍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绘有天象图（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除磁县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了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前不久发现的山西王家峰北齐壁画墓也保存着一百多平方米的壁画。而意作为「陵葬」的北响堂山也应该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见赵立春文《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这种现象从北洞前壁（物像外减地）平浮雕的「帝后礼佛图」和壁脚供养天人的雕刻风格也可窥一斑——其雕刻的画面仅有人物的外轮廓，颇似现在的剪影效果，而细部的五官、服饰、项坠等必然是采用壁画的形式绘出。这种风格一但形成自然会影响到以后开凿的洞窟。所以，北响堂中洞、南响堂一、二、四、六窟才会有大面积的素壁出现；南响堂第四窟与第六窟的形式基本相同，与第五窟和下层的第二窟合为一组楼阁式的塔形窟。上层的四、五、六窟是以五窟为中心的对称布局。四、六窟均为三壁设坛，坛上造像，现在洞窟内的造像已经残无，但墙壁上仍存有造像的轮廓痕迹，而这些轮廓仅仅是佛或弟子菩萨的躯体部分，并没有背光或头光的痕迹。所以，我们分析，当时的背光和头光应该是在墙壁上绘出而非雕出，这些彩绘的头光和背光又与墙壁上绘出的壁画浑然一体，彩绘与石雕的有机结合，使洞窟内更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第四窟左右壁上部刻经位置的高度来看，似乎也占去了佛像背后应该

作为举舟形背光的部位，存在一种打破关系。这就为刻经与石窟是统一设计的观点打上了一个问号。

对南响堂刻经年代的研究，有一处重要的碑记应该引起注意。在第四窟门外的右侧有隋代碑记一方，该碑为隋「开皇十三年」的重修碑，由于风化严重文字多磨泐不清，但据水野清一《响堂山石窟》一书中记载，其录文中有「……太素之始。坟书湮灭。既分既立……河东桑泉人也。以开皇十三年一月……绍之扞从□则当□□净土。迁神乐国」等文字。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在《攘古录》卷六（石文）中将此碑称作「鼓山县□□刻经记残字」。那么，这块碑就有可能是在隋代的刻经碑记。《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天下郡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从风」。开皇三年（583年）又下诏：「朕钦崇圣教，念有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辩证论》卷三）。开皇四年（584年）还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再行安置」（《历代三宝记》）。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载，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十三年（583年）又下诏，「修复周武所毁之佛像，遗经，并发露忏悔，文帝及后各施绢十二万匹，王公以下及黎庶人施钱百万，参与忏悔者四十余万人」。响堂山石窟继唐邕之后的再一次刻经活动可能就在此时，若此就与该碑的记载也相符合。因此，我们综合上述分析，南响堂第一窟、第二窟内的刻经有可能是在此刻造，而并不是与石窟同时代。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的刻经书法风格来看，更接近于下层第二窟门左右侧的隋代《崧山石窟之碑》。因此，《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的镌刻年代上限也应该不超过北齐。而又据刻经中出现的「世」「民」二字的避讳情况来综合推断，第四窟《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的镌刻年代大约在隋开皇至唐初这个阶段。另，在《续寰宇访碑录》和《畿辅碑目》中将《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的镌刻年代更确切地定为隋代开皇年间，应该有一定道理。

南响堂石窟的刻经年代，过去，曾笼统地与唐邕刻经合为一谈。实际上，南响堂的刻经也是受北响堂唐邕刻经的影响。

关于北响堂的刻经时间，现存于第三窟外的《唐邕写经碑》有详细的记载。其碑在第三窟摩崖刻经的西壁依崖刻出，计20行，行45字，碑中记载：「晋昌郡开国公唐邕……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孝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568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572年）岁次壬辰五月二十六日……山从水火，此方无坏」。这段碑文详细叙述了刻经的时间、写经人及写经意义。为我们研究北朝刻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唐邕写经碑》中只记录了唐邕所刻的四部佛经。而《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无量义经·德行品》、《二十五佛名、十二部经名及《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弥勒佛、师子佛、明炎佛）、《大圣十号等刻石均未有记载。《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刻在大业洞外，据不完全考证，可能与大业洞开凿有一定关系。其镌刻的时间应该在隋代。《无量义经·德行品》、《二十五佛名、十二部经名及三佛名（弥勒佛、师子佛、明炎佛）、大圣十号等刻石的书体风格和刀法比较接近，应该是同时代或相去不远。而三佛名号的书体风格与南响堂第一窟内的《文殊般若经》如出一辙，应该属同时代的作品。因此，这些刻经的年代也应该在隋代。

关于唐邕，《北史》卷55传曰「邕，字道和，太原晋阳人，善书计，性识明敏有才干，曾奉侍北齐诸帝，帝甚重之。文宣一日之中六度赐物，频年出塞邕必陪从。」唐邕在东魏高欢作丞相之时，很为信任，典外兵。北齐立国后，「邕以老成硕望，官至录尚书事，兼领度支」。天统初出为赵州刺史，还右仆射，又还尚书令，封晋昌王录尚书事。武平初坐断阿事为御史所劾除名，后又复出」。在史书中没有提到唐邕刻写佛经之事，但不难看出唐邕在当时以善书能文而为人所重。他